



宋 琳 / 著

诗人随笔丛书

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宋 琳/著

诗人随笔丛书

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 / 宋琳著. — 北京 :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635-3690-0

I. ①对… II. ①宋…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0878号

书 名: 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

作 者: 宋 琳

策 划 人: 刘玉雯 彭莎莎

责任编辑: 彭莎莎

装帧设计: 林德锋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邮编 100876)

发 行 部: 电话: 010-62282185 传真: 010-62283578

E-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 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7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35-3690-0

定价: 36.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目录

第一辑/1

寄自巴黎/3

圣纳泽尔日记/14

探戈的故乡/35

秘鲁散记/69

挪威屋/79

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84

第二辑/89

同人于野/91

心灵城邦的信使/112

从口吃中救出词/127

备忘录：一份诗学提纲/134

河流/151

散句/153

《亲爱的张枣》缘起/157

词语和家国的天平/164

艾基诗歌朗诵会上的发言/179

译者小札：关于诗人艾基/182

由《天问诗歌公约》想到的/185

口弦的传说与歌谣/188

《手艺坊》杂谈/191

关于“翻译工场”的通信/193

第三辑/195

傀儡的仪典/197

述作与反观/205

哈梅尔梭的孤独/213

欢迎到马戏团来/216

视觉的诗/220

密响旁通/226

跋南方水墨山水册/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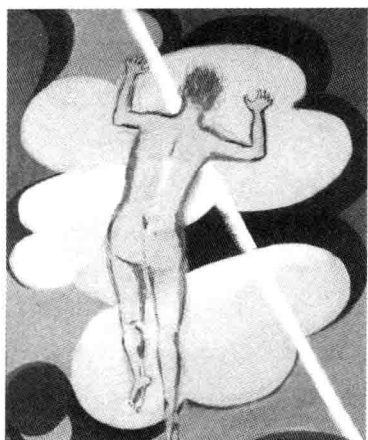
王艾的“写画”/230

“三寸金莲”的反讽/232

诗歌曾经抚慰过我们/235

途中的秘密/242

跋/269



“从梦中往外跳伞”——取材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序曲》

第一辑

寄自巴黎

—

今天天气格外好。11点，我从孟明家出发去位于拉丁区拉巴列特街7号的文字书店Caractères，它也是一家小型出版社。地铁出来向一个老人问路时，他反问我“是诗歌书店吧？”于是我在街道的小斜坡上发现了那个长条漆木招牌。橱窗里陈列着一些样书，背景是一幅中国水墨画，而橱窗周围外墙的涂料已出现剥蚀。

史蒂凡在街角出现了，他是我的师兄，多年未见，我听说他因病取消了去北京的行程，接着尚德兰匆匆赶来，他们是来谈翻译出版的事宜。书店兼出版社的女老板格达利娅夫人热情洋溢，光芒四射。不知为何，一见面她就给我似曾相识的印象，原来我把她和斯坦因夫人联系起来了（我见过毕加索那幅肖像画），她们很相像，况且，她也是犹太人。书店是她丈夫、来自波兰的诗人杜罗歇尔于1949年流亡法国后创立的，那时他刚从集中营出来，在蒙巴纳斯的一家只花一法郎就能吃到午餐的饭店里，有人送给他一部印刷机，条件是把身边那些诗人的作品印出来，他欣然接受了这项委任。然后，半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坊印行了包括里尔克、庞德、聂鲁达、佩索阿、洛尔加、埃利蒂斯、儒佛、米沃什、布托尔等诗人在内的书。我在书架上看到

聂鲁达的《法国、西班牙对拉美文学的影响》、佩索阿的《烟草店及其他》、杜因克尔（荷兰诗人）的《列出的清单》。书一律是白色的封面，有些丛书印上了漂亮的木刻徽章。随手拿起一本克莱里写的巴黎神话《穿睡衣的塞纳河》，我觉得画家布拉伊的插图甜蜜而性感，他把PARIS的每个字母变成人体的局部，背景图式与新凯旋门的结构相似。在“行星”、“人之路”、“访谈”、“经典”等丛书中，诗歌与摄影作品的合集可谓珠联璧合。

格达利娅夫人抱怨发行公司促销不力，导致好书不能及时送到读者手中，而她的办公室几乎成了书库。她招待我们在店堂里共进午餐，去里面搬椅子时我看见包扎成一摞摞的书籍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她变魔术似的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桌布，又从对街的一家饭店点了奶酪圆饼和色拉。塞琳娜，书店的见习女生也里外张罗着，她是格达利娅夫人留短发的唯一女战士，夫人根本雇不起正式店员，所有的书籍选题、审稿、校对都由她自己做，塞琳娜则负责打字与排版。“最快乐的事情是有人向我推荐书稿的时候。要知道有多少书值得印出来啊！”然而书印出后她就放开不去管了。杜罗歇尔先生五年前已去世，即使在他的时代，朋友也经常拿书店的不景气取乐。“拔去你的山羊胡，你就将一无所有。”格达利娅夫人模拟那种调侃语气时笑得很开心。

其实她和他本人都是充满激情的诗人呢。他们命中注定的邂逅听起来像传奇。那个关于耳环的故事足以使迷信的人对前世姻缘深信不疑。她糊里糊涂把它弄丢了，到处找不着，他却鬼使神差地在大街上捡到了它；她少女时期在某个博物馆看到一尊雕像，多年后证实竟然就是他的形象；在集中营里为人代写情书的她的“波兰的兰波”，在途经卡桑布兰卡开往黑非洲的爱神号轮船上遇见了她……“五月风暴”时期他们第一次合作出版了令人难忘的《革命诗篇》，以及……喝着咖啡，她就这样用崇拜的口吻回忆着，诉说着亲爱的已故丈夫。

今年三月，她再版了他1972年获法兰西学院奖的诗集《抹去的圆圈》，并且刊印了自己的诗集《主导之岸》。这两本袖珍诗集属于双

子星座、耳环或类似的纪念物，她取下来题了辞赠送给我。她的无题诗飘散着浓郁的“爱的芳香”，那些诗句在她为别人建造的诗歌圣殿里，谦卑而邻近至高的祝福：

不可见的联系
古老的环节
内在生命的蜿蜒

你的微笑穿过
同盟之链

二

直到晚上八点，我才决定出去散步，从“沼泽地”到左岸的拉丁区。市政厅前广场和塞纳河边的人造沙滩上“长出”了棕榈树，撑起蓝白相间的遮阳伞，到处是裸露的人群。环法自行车赛事一过，巴黎就进入了旅游旺季。

新桥那些阳台状的突出部分适合于瞭望。就是在新桥上，一个我此刻记不起名字的法国人从眼镜店出来，突然想起这座美丽的城市某一天会从地球上消失，便油然而产生了一种恐惧，这恐惧敦促他为巴黎写下一本书。类似的心境也产生了中国的《洛阳伽蓝记》、《板桥杂记》和《西湖梦寻》。带着散步时兴奋的思绪我过了桥。

闻名遐迩的莎士比亚书屋在桥头左侧，它曾经使爱尔兰作家乔伊斯聚讼纷纭并在西方家喻户晓。《尤利西斯》这部用英文写成的巨著的处女版，不在别处，竟是在法国印行的，这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引起的风波恰好形成对照。不管怎样，法国是更加宽容的，否则，从20世纪初以来，就不会有那么多艺术家从其他国家云集到巴黎。

来自英伦三岛的作家除了乔伊斯，还有贝克特和王尔德。贝克特沉默寡言，跟朋友在咖啡馆见面可以几个小时不说话，他用法文写

作，书全由午夜出版社出版；王尔德从里丁监狱出来后即隐居巴黎，他住的旅馆就在离此不远的美术街13号。这位快乐王子、唯美主义者，冥想过基督，巴黎给了他最后的抚慰。我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找到他的墓地时，恰好一位少女也在那面旗帜形状的墓碑下凭吊，这一景象很动人，后来成为我一首诗的灵感。我猜测，要是王尔德活到上世纪20年代，他准会成为莎士比亚书室的常客。

上回我带着来自美国的老朋友查建渝和与之同行的孙雅各牧师满城跑，我们来到书屋。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惠特曼先生——与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同姓的乔治·惠特曼。有一张照片显示：他在书屋门外朗诵，几步之遥围坐着一群热情的听众，而他们抬头就能看见铭刻在墙上的、他的著名同族的头像，以及两行诗：

陌生的过路人，你并不知道
我是带着怎样的欲火看着你

老人满头乱发，样子像个流浪汉。作为书店兼旅馆的主人，接待过无数远道而来的年轻人，他们像野草一般筑起这塞纳河岸的记忆之巢。楼梯上方的护栏上卧着一只黑猫，它懒洋洋地容忍着我的抚摸。如果高兴，它也可以待在床上，二楼的三个房间摆着两张床。我见过几个说英语的年轻人手握酒杯，在这个铺着地毯、被精装本旧书籍包围的逼仄空间里高谈阔论，仿佛在他们英国或美国的家中。

惠特曼先生听说我们是中国人，立即把一串钥匙交到三人中离他较近的我手中。我们理解这是好客的表现，但他的举动还是让我们感到意外。钥匙总是意味深长，把它交给你即是一种允诺。作为对他的热情的回报，我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劳伦斯·斯特恩的长篇小说《感伤的旅行》，作者以虚构的方式讲述了他法国和意大利的一次真实旅行。或许只是巧合，书的附录部分“政治罗曼司”有如下题记：“附上一把钥匙”，这使我联想到曼杰斯塔姆流亡途中的诗句：“我还有一把莫斯科的钥匙”，以及策兰的“带上一把可变的钥

匙”，而耶稣的门徒彼得掌握着进入天堂的钥匙。总之，做客的人对此不可能不敏感。

1919年11月17日，西尔维娅·毕奇女士创立了莎士比亚书屋。惠特曼先生为了纪念他的先行者，给自己的女儿取名西尔维娅。不久前，他将许多美丽女顾客充满幻想和感激的来信结集成册。第一卷：隐匿的天使。当我从窗前近眺河对岸巴黎圣母院的塔林，夜幕已经降下，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此时有天使从那里飞过，我并不会过分惊奇。

三

在法国，谈起书与电视的话题，很多人都会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起*Apostrophes*这个电视读书杂志，它是法国电视二台在1975年至1990年间，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半播出的一个读书节目。主持人贝尔纳·毕沃（Bernad Pivot）先生，身兼《读书》杂志主编，为了准备节目，每天用于读书的时间在四至十五小时之间，据说平均每周读五本书，十五年间，至少读了三千五百本书。作为读书节目的主持人，他把读书视为一种行业，因此之故，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读者。在接受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先生的采访时，他谈到了以读书为业的心情：“为了全力以赴，我排除了一切的世俗应酬、个人嗜好——电影、种种娱乐以及与金钱有关的活动，但仍旧不能避免情绪的波动，感觉幸福，感觉沮丧。”

毕沃毕竟不是普通的读者，他的真正角色是书籍与读者之间的推销员，受聘于电视台，他竭尽所能充分地利用屏幕为阅读服务。*Apostrophe*这个词既有问难的意思，又是表示两个词之间省略一个元音的符号，毕沃以它的复数形式命名节目，至少表明三层意义。1.从一般读者关心的角度对作家提出直指核心的追问；2.把作家请上电视与观众面对面，正如两个元音相互碰撞一样，可望发生共鸣；3.阅读不是孤立的现象。毕沃创造了奇迹，他的节目收视率曾经突破五百万之数，十五年间他在读书界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一本书经过他的推

荐，第二天图书市场就可能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有一个较近的例子。长篇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作家、电影导演戴思杰著）2000年出版后非常畅销，据说这本书一开始就得到毕佛的热情赞扬。

毕沃的方式通常是就一本他喜欢的新书选择一个主题，邀请一个或几个嘉宾围绕主题展开交谈或论辩，嘉宾的组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立场、观念越不同就越有看点。譬如他把萨冈和罗兰·巴特请到一起畅谈《恋人絮语》，二人对爱情的看法却几乎相左；还给语言学家和喜剧演员、哲学家和巧克力专家提供邂逅的机会。他喜欢直播，这样更逼真，更自然，也更有挑战性。有时他直接到作者家中摄制，因为观众总是乐意看到作家的日常生活场景。1975年4月，节目刚开始不久，他就率领一个庞大的摄制组去美国采访前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同时向观众披露了这位“可怕的见证者”的流亡生活和极富人情味的个人形象。同他合作过的作家、知识分子还有纳博科夫、尤瑟纳尔、布迪厄、略萨、杜拉斯、杜弗、密特朗、艾柯、科恩……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电视上的宾主漫谈完全属于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巴黎沙龙传统，只不过电视的传播手段能把知识精英的思想成果更快捷地传递给民众，作为“知识性的综合节目”，*Apostrophes*的信念就是“推销书籍、推销读书、推销读书的乐趣”。

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电视对生活的影响，不断地切换频道颇像分身术，或做一个连续的噩梦。玛格丽特·杜拉斯曾说：“看电视如同站着睡觉。”她还把电视的作用比喻成一种能够杀死所有社会活力的除莠剂（见《明天，人类》）。互联网的出现又进一步对所谓读图时代的快速到来推波助澜，知识分子的忧患可总括为一句与马拉美相反的慨叹——“肉体狂欢，唉！书不再有人阅读。”（马拉美的诗句本是：“肉体悲愁，唉！我已读完群书。”）然而，面对这样的现状，一筹莫展又能怎样？一种读书风气的形成即使在最不利的多媒体条件下仍有待于重新找回读者的勇气和文化对策。哲学家波德里亚曾将毕沃与列维-斯特劳斯相提并论：“在知识分子的排行榜上，毕沃

和列维-斯特劳斯当并列前茅。起初令人难以理解。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同一类人。毕沃是视听文化的萨满教巫师，视听文化从书写文化中吸取食粮；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是文字文化的萨满教巫师，文字文化从无文字的社会汲取营养。”（《冷记忆2》）毕沃正是通过电视创造了视听文化中的个人神话，他的节目影响了一代人的读书习惯，声名远播国外。他那浓浓的眉毛、机敏的口才、眼镜、手势、拉赫马尼洛夫音乐背景、适度的亲热、噱头、隽语，都乘上屏幕的知识飞毯进入法兰西的千家万户：

阿尔菲河迷失在大海里，又在另一块大陆上涌现。作家、知识分子就像阿尔菲河一样，在星期五晚上迷失在电视里，他们脆弱、模糊、珍贵的言谈，有一天会在没有料到的土地上涌现。

四

我所到过的城市中也许只有巴黎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幻象。纽约非常疯狂，但过于简洁，不容易产生恍惚，至少在曼哈顿你不会迷路，最令人不解的是街道都以数字命名，我喜欢的是它那超人的尺度给人的震撼，它咄咄逼人的、水泥和金属的海拔——除非生活在一个空间站里，人很难避免成为“城市肠道内的菌虫”。巴黎不一样，它是幸存下来的城市，不仅是历史沉积，还有迷宫般的地理，表面的时髦、实际的冷漠，带着难以接近的暧昧的挑逗。巴黎因此难以穷尽，总有更多的东西尚未显露出来。毫无疑问，巴黎是一部百科全书，但它的索引却是隐形的。那么多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者，他们的神态告诉你：“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出门前上衣口袋里揣一本小开本的书，我到Cité des arts（艺术城）去拜访南方，穿过Rivoli大道，拐到Michere书店，照例会进去看看。书店以女店主的名字命名，因我是常客，我们已彼此熟悉了。我想买曼杰斯塔姆遗孀的回忆录第二卷《希望荡然无存》，却意外地发现一本16世纪葡萄牙神父路易士·弗拉的《欧洲人和日本人》，这

本橘黄封面的小书很不起眼，写于1585年——弗拉神父在日本传教期间，副标题是“有关相反或相异的习俗”，列维-斯特劳斯作序。涉及劳作、居住、服饰、武器、音乐、宗教、船舶和日常生活主要方面的比较，用简单的笔录方式写成，读起来像一部比较文化袖珍辞典。我花了59法郎买下这本九十页的书，浏览之际不禁想要随手译出几节以便让你一睹为快：

在欧洲，演员戴着面具一个接一个缓慢入场；在日本，演员三三两两同时入场，动作迅速，面对面，像斗鸡一般。

欧洲舞蹈主要是脚的运动，日本舞蹈显得庄重，大部分时间用手。

欧洲人认为用手杀苍蝇是脏的；在日本，王子和将军杀死苍蝇时先拔去翅膀再扔掉它们。

欧洲人无论大小都害怕黑夜，日本人男女老少都对黑夜毫无惧色。

欧洲妇女很少善于书写，一个体面的日本妇人如果不会写字将要被人瞧不起。

在欧洲，妇女喝酒是失礼的，日本妇女喝酒则不鲜见，节日期间她们常常喝到随地而卧。

我们在木桩或动物身上练习剑术，日本人却在人的尸体上练习。

在欧洲，人们在广场或街道上讨论和消遣，在日本，这一切则仅仅在家中进行，街道只是为了走路。

告别或迎接时我们习惯相互拥抱，日本人不知这一礼节，看我们这样做时他们发笑。

我们从左边上马，日本人从右边。

当有火警时，我们欧洲人取水赶来并拆毁毗邻的房屋（以免火势蔓延），日本人则爬上别人的屋顶，煽动生火用的草扇，喝令风离开。

巴黎人之爱好在公共场所读书，跟他们喜欢当众表演“法兰西之

吻”一样，是我在别的西方城市亦较少目睹的。除了图书馆那种专供阅读的设施之外，咖啡馆无疑是首选的公共阅读空间。隔着玻璃墙，一边读书，一边还可以浏览街景和过往行人。咖啡馆是便于观察之所。海明威当年就是在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温馨、干净、充满人情味”的咖啡馆中写他的密西根故事的。他喝马丁尼兰姆酒，差点把一个面前的美人写进了小说。依鄙人之见，你没有必要非到“丁香”、“圆顶”或“双猴”、“花神”去，（尽管萨特曾说：“通往‘花神’之路乃通往自由之路。”）巴黎城内差不多每走五十步就能找到一家宜人的咖啡馆。如果你多多勾留，怀着憧憬，“市井之花”就会适时开放。

在阅读习惯方面，如同性格方面，巴黎人的确显得有几分与众不同，在地铁车厢里常会看到，两个面对面坐下的人，对视一眼，便各自掏出一本书或杂志报纸读起来。个中三昧我是慢慢体悟到的。设想在那小小空间里，人和人离得如此近，为了避免把呼吸喷吐到别人身上，或虎视眈眈的尴尬，以书为掌上屏风也是一种礼貌。再则，设想一个穿越全城上班下班的人，要在地铁上耗费一整个小时，又不能像公共汽车那样凭窗观景，没有读物该有多郁闷。当地绅士淑女固然如此，异乡人居住久了，也习染上这种风雅。有一次我急促出门，忘了带书，正在后悔之际，却见一个穿着宽大的提花布长裙，戴着漂亮头巾的高个子黑人妇女，她站在车厢连接处，手捧书册，目不旁顾，气定神闲的样子，真让我惊羡不已。至于她读的书属于什么语种，中文？日文？阿拉伯文？在这各类肤色人种杂居的城市又有谁会过问？

巴尔扎克说：“大多数人在巴黎散步就像他们吃饭，活着，不假思索……巴黎的游荡，美妙又甜蜜！游荡是科学，是眼睛的饕宴。”（《结婚的生理学》）然而，出门散步时若逢晴朗的天气，带一本书到户外阅读就更助游兴。诗人阿波里奈尔不太喜欢待在图书馆里，他宁愿到塞纳河堤上随便找个景色与空气俱佳的所在，让散步之行程与阅读之行程像更换舞伴一样自由交替。尽管这一类漫不经心的阅读并不能保证你成为饱学之士，至少能给你闲雅的愉悦。例如，在卢森

堡花园或杜勒丽花园随处摆放的椅子上坐着，把书签夹回正在读的书页，合上书，揉揉眼睛，目光任意掠过涟漪、花木、雕像、鸽子、塔尖，书中的某个句子便会在远方为你勾画出一条感觉的地平线。

五

位于圣日耳曼德普雷和卢森堡公园之间的圣苏尔比斯广场，不仅有造型奇特的双层拱廊教堂（立面由佛罗伦萨建筑师赛万多尼设计），广场中心还有一处喷泉，其四面饰有四位基督教著名布道者（布苏叶，费尼龙，弗莱西尔和玛希翁）的雕像。观看露天电影的人，有的就坐在喷泉的池沿上。歌舞片《让娜和棒小伙子》，讲一个女孩与得了艾滋病的男朋友难分难舍的爱情故事。雅各开车陪我前去，因在路上遇到了点麻烦，到达时电影已经开映了。

“巡回露天电影节”是巴黎市政厅颇有点怀旧意味的举措，据说，节目的安排亦讲究电影中的场景与放映地点的对应。例如，《北方旅馆》选择在运河一带放映，因为故事就发生在该地。同理，如果放映《旺多姆广场》，最佳地点自然是在旺多姆广场了。如此等等。王尔德说：“大自然模仿了艺术。”露天电影的观众或许会发现，日常生活的场景亦模仿了银幕上的影像。

对于喜欢回顾一下老电影的观众来说，在圣苏尔比斯广场放映《三个火枪手》也不失一种历史情调，因为火枪手达尔丹尼从外省徒步进入巴黎后落脚的波拿西厄先生家，就在穿过广场的赛万多尼街（原名掘墓人街），并且，另一个火枪手阿哈米的家也在这里。意大利作家艾柯在《小说林中及别处的六次散步》书中，对该街区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

作为经验丰富的读者，如果我们动情地回忆起赛万多尼街，那是因为罗兰·巴特曾经住在这条街上。阿哈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住在赛万多尼街角，因为故事（指《三个火枪手》）发生于1625年，而佛罗伦萨建筑师乔万尼·尼古拉·赛万多尼出生于1695年，他为教堂立面

画设计图是在1733年，而这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则是1806年的事了。

艾柯指出了大仲马的一个过失，即小说中出现的赛万多尼街在三个火枪手的时代还不存在。正如雨果所说：“城市是岩石的《圣经》”，巴黎这座古老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隐藏着许多像《圣经》密码一样难以破解的文化密码，或密码的密码，对它的阅读需要考古式的挖掘，有多少东西被覆盖在时间的尘埃下面。如果不小心分辨，即使对王宫和巴黎旧城了如指掌的大仲马也难免在某一地点迷失。有一次，我回到曾居住过两年的夏蓬街，抬头看路牌时发现下方露出了原来的街名：尼古拉公墓街。那几个字是刻在石头上的，因涂料剥落才显现了出来。想象一下我们居住的街区原本是死者的领地，就会为自己活着这件事感到惊奇。

更多游客为圣苏尔比斯广场所吸引，肯定跟克里斯蒂安·迪奥和伊夫·圣洛朗这两家著名时装店有关，对那橱窗里的陈设，你很难不投去艳羡的目光。但这座广场令我喜欢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古老、它的建筑风格和周围温馨气氛，还在于每年六月在此举办的诗歌书展。每年六月间的一个星期，法国各地的出版社云集这里，在广场上搭起形形色色的书摊。注意：展出的是诗歌，而不是鸡蛋或奶酪。同各类沙龙、朗诵会、诗歌节、地铁里的诗歌招贴一样，诗歌书展构成巴黎人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巴黎是博览会之都，人们从小就养成观看展览的习惯，此类书展除了像花市和鸟市一样，带给人美好和愉悦，它本身也是一种“诗歌行动”。在此顺便一提，参展的杂志之一，其《诗歌行动》的命名就传达出一种意愿，即诗歌对广场和人群、对广阔的生活空间的永久向往。

2003-8